

# 信 息 参 考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19 期）

## 高校智库建设专题

党政办公室编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专题报道】

#### 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贡献力量

刘延东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 (1)

【中国教育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教内涵发展重要课题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写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召开之际 ..... (2)

2013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召开 ..... (6)

### 【高教研究】

智库建设研究报告 ..... (8)

### 【专家视点】

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 (26)

当前国际知名智库发展向何处去 ..... (29)

### 【院校扫描】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积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新型智库 ..... (32)

北京师范大学以新型智库建设 推进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 (34)

南京大学智库建设 重协同 筑平台 出成果 ..... (36)

浙江大学在“顶天立地”中推进一流智库建设 ..... (37)

## 【专题报道】

### 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贡献力量 ——刘延东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201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

刘延东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

刘延东强调，高校要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坚持求真务实、奋发有为，多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努力做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要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平台建设，强化协同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推动形成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智库发展新格局。要深化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研究，提升中国话语权，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 【中国教育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教内涵发展重要课题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 ——写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座谈会召开之际

服务决策、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任务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

5月30日，“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在教育部举行。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何种优势？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 服务决策——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

当今世界，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作用日益凸显，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被学者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还是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都越来越需要智库的思想支撑，发挥智库“咨政启民”的作用。

智库建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陶德麟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新的长征。这个梦之所以不是幻想和空想，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道路——中国道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及时总结改革发展实践经验，解答群众思想困惑，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激发人民精神动力。为此，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

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智库建设是服务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在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看来，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也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事物、新挑战，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课题。

智库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 30 多年保持近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增长 30 多倍，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贸规模世界第一。但是，软实力与大学应有的地位还不相称，缺乏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 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世界前 50 名的智库中，中国只有 6 家上榜。

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大问题，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专业理论工作者不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责任以自己的方式为丰富和发展这些成果贡献智慧。

### **高端智库——大学功能的重要载体**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可或缺的力量。

200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颁布后，教育部抓住机遇，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通过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不断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布局较为合理的学科体系，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脱颖而出，产生了一批有深度、影响广泛的优秀成果，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 15 万部，发表论文约 158 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 2 万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 70 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 100 项，向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提供咨询报告、政策建议 6 万余份，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达千余份。

经过近 10 年的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已初步形成。据统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人员总数达到 42.6 万人，聚集了全国 80% 以上的社科力量。

在 APEC 会议的国际舞台上，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工程建设中，在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中国高校学者积极参与咨询研究、政府决策服务的活跃身影。

在去年启动实施的“提高高等学校创新能力计划”中，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首批认定设立的 14 个“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尝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文理、军地、校所、校校协同创新，建设国际知名的南海研究学术创新体、南海战略决策的高端智库，面向中国海疆权益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大学是创造新观念、新知识的重要源泉，高校新型智库可以通过独创思想、独到观点等知识产品，对决策者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既面临着更大需求、更大舞台、更大贡献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学科建设分散化、专业领域细分化、考核机制单一化、优秀专业人才不足、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

可以说，高校丰富的智力资源还远未得到有效利用。“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改革力度不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

### **重大问题——高校智库的职责所系**

当前，努力建设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离不开、用得上”的高校智库，为服务中央科学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已成为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座谈会上，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重要讲话要求，与会代表达成共识，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目标，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建言献策质量为根本，以深入实施“2011 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为抓

手，努力打造一批“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为此，应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高校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形成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研究成果。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高校建设新型智库，必须与国家教育、科技改革紧密结合，改进评价机制、大力推进协同、改革管理方式，形成改革合力，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发挥学科优势，加强平台建设。高校应紧紧依托优势学科群，在继续扶持基础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多学科深度融合，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形成一批有集成优势的智库研究平台。同时，适应信息化发展新趋势，促进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构筑智库建设的支撑平台。

——会聚高端人才，打造一流团队。高校要营造良好环境，鼓励更多优秀人才参与决策咨询，造就一批真知灼见的思想家、重大战略的参谋者、科学决策的建言人，形成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学术功底深厚、专于应用研究、善于传播推广的智库人才队伍。把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吸纳青年师生参与研究，为智库提供人才储备。

——深化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高校要通过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搭建中外智库联合研究的高端平台，推动交流互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思考中国，在深度参与国际对话中提升话语权，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 2013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召开

2013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会于 3 月 21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副秘书长、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傅华，市教委副主任付志峰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北京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 130 多位社科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社科规划办王祥武主任作了题为“以十八大精神为引领，扎实做好北京社科规划各项工作”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的一年里，北京社科规划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工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立项、市社科规划项目组织实施、成果宣传推介等工作取得明显突破。2013 年要紧紧密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市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着力推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傅华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以首都意识统筹规划社科研究资源，以科学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完善规划、管理思路，规范、扎实、富有成效。今后，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要继续围绕学术之都建设和打造智库的目标来做：

一是要注重发现和培育战略科学家，使其善于站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和高地，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二是要注重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协同创新机制，有效合作，把学者们的思想凝结成智慧，产生智慧激荡。

三是要注重恪守科学规律，以学术研究、理论创新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服务的现实问题，以发现规律来描述科学发展，以科学精神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四是要注重致力于管理和服务创新，通过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创造一个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力竞相迸发、人才脱颖而出的新环境。

付志峰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市教委将联合各委办局，设置“市属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希望各市属高校能够紧密结合北京地区的发展，将社科研究与政府的工作紧密结合，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的代表先后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市社科规划项目管理、研究基地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经验进行了交流发言。会上还表彰了 2012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公布了 2012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验收结果。★



## 【高教研究】

### 智库建设研究报告

党政办公室

#### 一、智库的概念

##### (一)“智库”一词的缘起

智库(Think Tank),又可称为智库或脑库,顾名思义就是储备知识和提供思想的“仓库”。对于它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但人们普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该词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最初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制订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问题的军事服务部门(类似作战参谋部)。二战结束以后,“智库”一词开始被用于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发展部。20世纪50年代,该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但仍以研究与发展为名,只是将两个英文单词的首个字母复合而为RAND,即是人们所熟知的兰德公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兰德公司可谓是第一个被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随着兰德公司的问世,这种新兴的、与社会发展变化需求相适应的决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也迅速得到了人们的接受与肯定。20世纪60年代,随着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激增,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开始作为专用词汇而广泛流传开来,其范围也扩展到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的非政府研究机构。而到了70年代,智库已不仅仅是指从事战略、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其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已囊括当代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机构,如此也使得智库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概念。

##### (二)关于智库概念不同的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产生是与其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了孕育和产生现代智库的客观条件,同时也为现代智库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一旦决策者意识到现代智库对决策科学化的作用,尤其是对决策者自身利益的影响,智库也就左右逢源应运而生了。因此当智库率先在美国得以蓬勃发展以后,接下来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及地区也发展迅速。欧洲各国例如法国、英国和瑞典等以及亚洲的日本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智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效

仿西方国家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智库。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将近 5000 家各类型的智库，但是各国对智库所给出的定义却不尽相同。在美欧多数国家，智库一般是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甚至是大学）之外的、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隶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院系也被排除之外。这一定位显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对智库所给出的定义较之美国显然更具有灵活性，大体上但凡是从事政策性研究、为政府提供咨询以及决策参考的研究机构都可以被称之为智库。诸如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西方学者大体上也能接受它们是智库的说法。

由于世界各国的具体整治环境的不同，智库发育程度以及承担的社会职能也不同，因此直到今天，国际学术界对“智库”一词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同学者往往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关注的重心，对智库的概念内涵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如美国著名智库研究专家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认为：所谓智库就是“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非营利性的政治组织”。安德鲁·里奇的智库概念主要强调智库的机构运作特点，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智库作为一种咨询研究机构，主要依靠专家的意见和思想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而英国学者詹姆士等人则强调智库的社会组织功能，认为智库主要是指那些从事于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多学科研究的独立组织，智库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智库的首要目标是影响公共政策，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供决策建议。

也有学者更多的强调智库的社会制度性，认为智库是一种组织的安排（arrangement），企业部门、政府机构以及富人拿出经费，交给特定组织的研究人员，完成研究方案，影响政府决策，体现特定集团的利益。

### （三）智库与利益集团

如何区分智库与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贸易团体、经济文化交流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也是定义智库的另一难点。有些智库，如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会及传统基金会等，虽然直接就是以基金会为名，但却是十足的研究机构，与那些以投资、捐赠以及资助为目的的政府和私人组织，如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关于界限的划分相对较难，原因在于，智库与利益集团都是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的。具体而言，若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智库就必须像利益集团那样，擅长向政府部门推销自己的政策主张；若是真正想做到对政府产生影响，利益集团也必须像智库那样，对所游说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且细致的研究分析。因此，这两者之间呈现出渐行渐近的态势，要分辨起来确实不易。

但是归根结底，智库与利益集团毕竟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因此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分别。智库与利益集团的最大区别在于，智库不代表某一特定人群说话。

例如，传统基金会在原则和理念上一贯主张并支持美国人有拥有私人枪支的权利，但这也仅仅只流于政策主张，并不代表美国持枪者这一特定人群。而后者的代言人美国枪支协会（NRA）则是个典型的利益集团，因为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直接对政府施压，从而达到为枪支持有者谋利益的目的。其次，利益集团对当选人以资金捐赠相支持，却是以寻求回报为目的，因为它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而是确保当选的领导人执行与其利益相一致的政策。与之相反，智库只是就当前的政策来进行辩论和讨论并且提出建议。根据法律，它们不得对政府官员或某一政党提供任何经济以及财政上的支持。

#### （四）智库概念的界定

根据上述的内容和观点，一个机构之所以被称之为智库，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从智库的机构特性来说，它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智库与传统的“智囊”、“谋士”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个人。智库一般是以集体的智慧服务于决策的社会组织机构。智库所利用的是集体智慧，是通过充分发挥组织智商来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即通过专家、学者的聚集所产生的集体智慧服务于或影响决策者，为社会、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的组织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一般来说，智库主要是将决策者、管理者的成功经验或知识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形式化知识表述框架，以对管理者提供决策指导。有时就某些特定的公共政策问题，智库还要吸收跨国界的不同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专家，通过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吸收各方意见，使政

策思想、政策设计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度。另外，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相当稳定的组织架构，具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长期的运作能力。一些临时性的机构，如为某项政策决策而专门设立的专家论证小组或委员会等，虽然也是一种具有决策咨询服务功能的组织，但这类机构即使存在运作时间很长，但也不能算作智库。

其次，智库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内容是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包括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公共政策）两个方面，大到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以及政府改革纲领，小到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援助等，都在其中。政策研究主要是相对于纯学术研究而言的，智库一般不以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建设为己任，而是以解决现实性政策问题为主要的业务重心，强调实用性、时效性及对策性强的“经世致用”式研究。智库主要从事对各类公众关心的或者国家地位和安全的政策问题研究，就某些特定公共政策问题提供最优化的理论、策略和方案。为了增强研究的现实性，智库更强调集体合作式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研究的视角可以各不相同，但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现实。

第三，非营利。所谓的非营利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研究机构的宗旨并非为了赚钱、获利，另一方面是指研究产品不会直接转化为财富。实际上，智库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立足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它相对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以及公正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几乎现在所有的智库都在全力标榜自己“非营利”的这一特点，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智库均有不同的资金来源渠道；与此同时，一旦研究成果被政府机构所采纳，或研究人员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其潜在的、隐形的“利”可能远远比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要大得多。

第四，智库主要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为首要目标。智库虽然研究公共政策，但它们不像政府机构那样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即智库本身并没有任何行政执行能力。因此，智库只能通过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产品”，假借政府之手发挥其对社会运行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智库是依靠“影响”而生存的，没有了影响，智库存在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智库为了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其产品往往既讲深度，也讲速度；既搞大部头的著作，也追求短小精悍的政策性报告；既注重产品的质量，更重视成果的推广。一般来说，是

否有新思想、是否有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能否把成果推销出去，被视为一个智库能否成功的“三大法宝”。

第五，独立性是智库有别于其他政策研究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智库都具有某种特定背景，或者是政府背景，或者是党派色彩浓厚，又或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但在形式上，大多数智库仍然把“独立研究”作为其机构运作的基本原则。如美国大多数的智库都是不受国家控制的独立法人研究实体。美国的这些智库无论是财团富豪出资建立的（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还是政府部门资助成立的（如兰德公司、国会研究部），抑或是社会名流倡议设立的（如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它们在体制上都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或财团的直接控制。智库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为理事会或董事会，理事和董事大多由大财团的经理、董事、律师、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 二、智库的分类

国外智库可谓是数量繁多、五花八门。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各类智库有1000多个，是世界上智库最为发达的国家，仅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大大小小各种思想倾向的综合性或专业性的智库不下100个。而由于学术界对于智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无法给出一致的回答，因此对于智库类型的界定也存在着多种划分方法。

### （一）按照起源

按照起源来划分，智库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某些大富豪出资建立的，这类智库的命名多半都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由美国著名的工业家、慈善家卡内基于1910年11月25日他75岁生日之际资助1000万美元信托资金创办的。除此之外，还有巴特尔纪念研究所以及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毫无疑问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1945年10月美国空军上将H·阿诺德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开始制定“研究与发展计划”即“兰德计划”，旨在研究“大陆间战争的广泛课题”，且在翌年3月正式签订了合同并拨款1000万美元以维持该计划的各项活动直至这个新研究机构能够自立。然而由于后来合作双方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难以为继的矛盾，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形成自己的个性，兰德计划执行部门意欲自立门户。经过H.R.盖

泽等人的一番努力，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多方资助下，兰德计划执行部门终于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与 1948 年 5 月正式成立了兰德公司。第三类是由社会上持相同政见的人集资建立的，如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与三边委员会等。三边委员会就是一些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共同看法的企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发起并建立的。第四类是由离任总统或为纪念某个政治人物而创立的。这种由希望在离任后仍能继续发展其政治观念的前任总统和知名官员（或他们的追随者）创立的、带有政治遗产性质的智库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这类智库创建者的名气，使得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获得高额的资助。

## （二）按照隶属关系

智库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其创立与运行体现出不同的机构属性。从隶属关系来看，可以将智库划分为以下四类：

### 1. 官方智库

官方智库是指一国政府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为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政府内发挥着决策“内脑”的职能。根据官方智库的服务层级不同，官方智库又可划分为中央政府型智库和地方政府型智库，而根据中央政府的服务部门不同，官方智库又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美国的官方智库从服务对象的层次上可划分为直接服务与总统的官方智库、服务于中央行政部门的官方智库和服务于国会的官方智库等。官方智库的特点在于：与各级政府乃至最高决策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行政事业费全部或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智库的负责人往往由政府官员兼任，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一般来说，官方智库因其特殊的地位，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乃至全局决策者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

### 2. 半官方智库

半官方智库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但是对政府决策的制定同样有着重要作用的非政府机构。具体而言，半官方智库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资助的智库；另一类是与政府部门对口服务的各类智库。前者建立的方式多半是通过政府财政资助或投资，然后通过委托合同的形式来进行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尽管这类机构得到了政府或执政党的资助，但它们并

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或执政党，其服务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机关或执政党组织，也可以是一些大公司或企业。后者，与政府部门对口的智库，是指那些其研究方向与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相适应，与该部门之间有着直接的合作关系的智库。虽然政府的资助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经费更多的是来自一些大的基金会或公司的赞助，但由于它们与政府具体部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影响也相对较大。半官方智库通常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一般通过接受政府资助来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活动，二是它们往往与政府机构签订长期或短期的研究合同，三是政府部门和这些智库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做到随时互通信息。

### 3. 民间智库

所谓民间智库是指与官方智库相对应的，主要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体现民间声音或者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民间智库大多是由私人或民间团体创立，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其经费属于自筹。它们的研究人员主要是由专家、学者或者前政府官员组成。这类智库可以自由选择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从公平出发，为民间立言，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停呼喊。民间智库的特点在于集资方式灵活、研究涉及面宽、横向联系广以及课题选择比较自由，并且超脱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外。事实上，智库的“民间”性质并不影响它们与官方的密切联系和多边合作，美国的民间智库就表现得颇为活跃。在美国，一些大型的民间智库不仅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资金力量雄厚，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华盛顿地区，接近美国的权力中心，比较容易对决策层产生影响。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

### 4. 大学附属型智库

大学附属型智库主要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公司的资助或私人的捐款，其研究人员大多是来自校内各学科的教授、教师、访问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其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也都相当的广泛。由于其具有的独特优势，使得大学附属型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优势集中表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高层次人才密集；二是学科领先且综合性较强；三是资料丰富、信息灵通；四是具有良好的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除此之外，由于大学附属型智库所在的大学大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文化积淀深厚，因此拥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优势，易于形成一股良好的氛围来启发灵感、活跃思维及增强创新性，从而使这类智库更易于产生具有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成果以及政策建议。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动态研究所，以及耶鲁大学的经济发展中心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 三、国外智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智库出“点子”影响政治领导人，造“主义”引导民众，这就是国外智库在政府政策酝酿、形成、决策和评估等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真实写照。以美国为例，有人甚至将智库称之为美国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总而言之，智库的不断发展成长并在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是近几十年来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具体言之，智库在国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发挥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 （一）提供信息，生产新思想

智库又称“思想库”，从事“思想”生产和提供新的政策主张是智库的核心功能。新颖的见解可以改变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其政策优先的排列顺序，为其行动提供路标，促进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之间的合作，影响持久性规章制度的制定。国外智库一般通过长期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地倡导，以期使得这些主张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赏识与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例如 1992 年，一份由国际经济协会（IIE）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提出的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当时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最终创建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就曾经指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既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 and 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 （二）参与政府决策，提供政策设计方案



世界各国的多数智库大都以承担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作为自己的业务重心，并且经常围绕本国政府所关注的国家内政外交以及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定期或者不定期推出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或书籍。因此可以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的情况，往往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大多数智库都会在总统就任前后公布其政策思想方案，以期对新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传统基金会在 1980 年推出的《领导人的职责》，对里根政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府官员曾经人手一册；进步政策研究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的《变革方案》，则被克林顿政府奉为圭臬。

#### 四、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智库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巨大，当前国际学术界上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的智库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美国智库，往往被学者定义为国际智库发展的典范。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智库热”的兴起，关于中国智库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受到中国特殊的社会体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化的影响，中国智库无论是在组织形式，还是在运营机制方面与西方的智库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自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各具特色的智库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然而，在看到我国智库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与美国这样的智库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的发展仍有着明显的差距。

##### （一）我国智库的发展历程

总体上看，我国智库经历了从成立到初步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66 年），体制内创立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体制约束，我国的政策性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体制内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于 1949 年 11 月由政务院设立了参事室（我国官方智库的雏形）。这一时期，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独立性相对较弱，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必须服务于国家的基本政策方针与政治路线。当时智库内的科研分子通常被西方学者称为官

方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国际外交基本没有话语权。虽然，他们其中也不乏掌握深厚理论知识与专业素养的专家人才，但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始终跳脱不出党中央和政府的思想，很难进行开拓性研究。

第二个阶段（1967—1976 年），停滞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得我国智库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在这一时期，除了一小部分受到特殊保护的专家和科研机构外，全国的学术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冲击。

第三个阶段（1977—1991 年），全面恢复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稳步发展。1977 年 5 月，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重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后各省市的社科院也相继成立，由此标志着中国以研究社会科学为主的专业性智库的全面崛起，从而也迎来了我国智库发展的“第一个活跃期”。如 1981 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 4 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 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又合并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第四个阶段（1992—2000 年），初步繁荣时期。官方智库的政策咨询工作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业务量逐渐增加，研究质量也不断提高，从事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而也迎来了我国智库发展进入了“第二个活跃期”。这一时期，我国智库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国家方针政策的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与此同时，传统官方研究机构中的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智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我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另外，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 工程”和“985 工程”，高校下属的智库机构也开始高速发展，国内一些重点高校还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各种学科人才，使得大学附属型智库也初具规模。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我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的需要，对智库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发展迅猛以及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智库这种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决策咨询机构

为国家各项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其特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 （二）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首份关于全球智库排名的研究报告，于 2009 年初由“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James Meghan）领导的项目组出台。

这份报告中显示，以数量来看美国智库最多，达到 1777 家，其次是英国的 283 家和德国的 186 家，亚洲最多的为印度拥有 121 家，其次为日本 105 家，而我国被认可的智库仅 74 家。报告还显示，全球 50 大“美国以外的智库”中，我国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榜，分列第 25 和 34 位。

从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上分，我国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即官方智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下属的专业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第二类是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第三类是民间注册企业的研究机构，即民间智库，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和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如今中国智库的格局，就是“三分天下、官方独大”。

### 1. 官方智库：中国的旋转门

这三类智库中，当属官方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建议的历史最悠久。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该所成立于 1956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由当时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提议并主持设立。起初，研究人员都是诸如孟用潜、陈翰笛、吴半农等这些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国际法专家以及翻译家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具有从事外交或政治活动的经验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正是官方智库在政策研究上的真实写照。据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介绍，“国研所的优势在于，首先研究政策性很强，这一点与外交部的思路正切合，因此对中央决策的参考价值较大。此外，直接快捷地获取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内政局形势等第一手材料，并从中捕捉到带有趋向性发展的消息，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国研所除了研究外交政策以外，还承担着为外交部储备并输送干部的职能。所里的每个研究人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必须外派到

使领馆进行锻炼，一期是四年。因为，研究人员只有具备了外交工作的实际经验，才能够走出学院式的研究方法和学院式的知识结构，向有深度的政策分析研究方向发展。事实上，历任国研所的所长都是外交官出身。现任所长马振岗曾经担任驻英大使，而前任所长曾担任驻德大使。与此同时，在研究所和驻外期间表现突出的研究人员还有可能被任命为大使或公使，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如此看来，“旋转门”机制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力度相对比较小，政府与研究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差。比如外交部只从其下属的事业单位吸纳和招募人才，显然，这一做法并没有向高校甚至是社会上的研究机构开放。

## 2. 大学附属型智库：参政与育人

既没有官方的政治压力与体制羁绊，同时又比民间智库更容易接近政府部门，这是大学研究机构得天独厚的优势。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创建于2007年9月，主要活动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定期出版书刊和学术报告以及承担一些政府课题。与官方智库所不同的是，大学研究机构并没有天然的渠道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靠的是个人的人脉关系及掌握的资源。据该中心主任孙哲介绍：“我们跟财政部、国台办、外交部都有合作。我们给政府做课题不是以经济为目的，而是为了扩大影响力，课题经费一般都不足以覆盖整个研究，所以要大力从社会上募集资金。”

与其他类型的智库相比，教育以及培养人才的功能在大学研究机构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与其教书育人的独特氛围和条件是分不开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湖对大学智库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大学一般做基础研究，在政策性上，大学的研究比部门内研究机构的研究更外围，但相对来讲也更客观。学校可以做长期研究，能够做得更长远深入。实际上，我国高校参与实际政策制定的过程很多。”比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与发改委规划部门有很多联系，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参与思路研究。清华公管NGO研究所与民政部民间事务管理部门有很多合作，公共管理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与中纪委也有些联系。

## 3. 民间智库：公众的“传话筒”

无论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还是政策支持或是信息获取方面，与官方智库

和大学智库相比，民间智库都处于劣势。事实上，目前我国的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5%左右，数量和规模都很小，最大的也只有2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仅约200万元。2006年11月，“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在北京召开，评选出了中国十大智库，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显然，这十大智库无一例外的都是官方智库，且都是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尽管这个评选结果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但仍然透出了中国智库格局的些许端倪，即不管是在政策影响力还是规模上，官方智库仍然占据了绝对优势。

从首届中国智库论坛评选出的十大智库里面，民间智库为零的事实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民间智库起步较晚。但现实是，政府决策需要来自各方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民间智库的出现，客观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尽管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陷，如它对官方的需求理解可能是不及时的，对于政策制定复杂性的把握也可能不到位等，但与体制内的官方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相比，由于民间智库的特殊性和独立的身份，它们的声​​音更加真实，观点更加客观，表达方式也更加自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视野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民间智库更能够反映公众意见，从而使政府决策变得更加科学、民主和公正。因此，促进民间智库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三）我国当前智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的数十年，我国智库不管是类型、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得到迅猛发展，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壮大的“黄金时期”。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我们也应注意到与国外一些知名智库之间的差距。造成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不足的原因，既有智库自身的原因，也与我国智库的发展环境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关。

#### 1. 咨询主体即官方、半官方智库缺乏相对独立性

根据西方智库的理论，智库应该是不受政府或财团直接控制的独立法人研究实体。而当前我国的智库，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出资或者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研究机构，或者称为“体制内”科研机构，智库

的运作具有很强的“官本位”色彩。其研究经费大多由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是靠吃“堂粮”，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这种与政府合二为一的决策咨询体系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或者是建议。

在政府决策中，政策咨询服务也往往向官方智库倾斜，甚至由官方智库所垄断，因此民间智库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咨询领域，进而导致民间智库的发育迟缓。即使是一些半官方性质的大学附属型智库，除非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否则也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咨询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政府控制智库，智库服从政府”的体制会大大降低了我国智库的社会公信力，其研究成果也难免会遭到公众的质疑。

## 2. 智库研究能力欠佳

智库研究工作的质量完全依赖于研究人员的能力。换言之，一个智库的水平，与其所拥有的研究人员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年不少专家信口开河，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称其为“砖家”。新华社《瞭望》杂志就曾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近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瞭望》称，2007年底，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然而仅仅两个月后，CPI达到8.7%的高值，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2%；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方的宽慰之谈，学者又提出“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的观点；2008年7月，国际油价冲击每桶147美元时，国内的能源机构专家几乎统一口径预测年底油价冲到每桶200美元，而最终35美元的新价位才棒喝住了这一切。以至于在两会期间，甚至有政协委员直言要“淘汰一批经济专家”。智库的这些“拙劣表现”让民众彻底失去了对这些所谓专家的信任。

一个智库，必须拥有一批学有专长，潜心研读国内外形势的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报告。国际上但凡有所建树的智库机构也必然拥有一支十分专业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如兰德公司就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应该说，中国绝不缺乏高素质的学者，但如何将这些学者组织起来，并且组建出高质量的智库，才是当务之急。

### 3. 国际话语权弱小

从目前来看，我国智库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能力不强，话语权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气比较典型的就是在 2008 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新疆“7.5”事件等案例中，中国智库在论述我方的观点方面相对弱势，在西方舆论上没有了自己的声音。

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中国模式”是在广泛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国广大民意和中国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基础上，结合领导核心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途径，突破和改写了西方经典理论，创造了中国人的奇迹。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界对“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关注得很不够，研究得很不够，宣传得也很不够，甚至出现了集体失语的现象。反观西方学者，其热心的程度和研究的深度令我们汗颜。若我们再不发声，我们再“谦虚不语”，就会放弃研究的主导权，就会丧失话语权。应该说，一国智库的国际密相关的。一方面，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国家需要本国智库为其在国际事务中发声，体现本国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智库研究能力的高低反过来也会对本国的国际政治以及经济地位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换言之，如果一国智库在国际问题上的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那么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随之倍增，反之，如果一国没有知名智库机构，即便是拥有较强大的国际硬实力，其国际软实力也会随之而大打折扣。

#### （四）我国智库发展面临的主要体制障碍

我国智库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体制所决定的，在推进智库机构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克服制约我国智库发展的机制瓶颈。

##### 1. 发展定位不够清晰

解决智库的发展定位，其核心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关于我国智库的角色定位存在两大误区，一种误区认为我国的智库，特别是官方智库，由于是政府出资设立的，因而其研究也要服从于政府的安排，承担政府交办的科研任务，为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理论性解释，

甚至要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寻找理由，全力为政府政策保驾护航。另一种误区是认为，独立性是智库存在的核心价值，智库要想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响，提出自己独立的政策规划和设想，在有些时候甚至不惜要与政府唱反调，以此来体现智库独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对于目前我国智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事实上，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不是非要划清界限，相反，应该是在相互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

其实，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要和政府保持距离。其一，政府是智库研究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智库与其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智库将研究成果更好地向政府输送；其二，政府是智库获得政策研究所必需的信息以及数据的最主要途径。没有这些资料，研究成果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其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智库不能公开赞同政府的观点。因此，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对智库而言不仅没必要，而且也没任何好处。真正的独立性丧失，表现在个别智库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工具。

智库真正要做到的是，要在如何发挥对政府的影响力与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之间寻找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事实上，智库的影响力和独立性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影响力有助于智库保持独立性。智库一旦有了影响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就会越大越多，那么智库获得的研究经费和影响渠道也就更多，这样就能帮助智库摆脱话语权的大小是与其所在国家的国际政治以及经济地位紧依附于单一财政来源的局面。另一方面，独立性是影响力的基础。保持独立性能更好的取得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一旦智库的非独立观点被政府和社会所察觉，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也会随之大大降低。

## 2. 管理体制不健全

受到传统体制机制的影响，目前我国智库的运作体制还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科研考核制度、成果推销制度等等。在科研考核方面，由于受到传统职称评定体系的影响，智库科研人员往往存在决策咨询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科研人员为了满足科研考核，不得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其从事的智库研究成果却往往得不到所在机构的认可，造成机构评价与社会评价之间的脱节。在成果推销方面，我国智库传统的手段是以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为主要途径，而国际上知名智库往往更重视通过公共渠道发布成果，让政策思想更快捷地影响公众。



要加强我国智库的建设，就必须加快我国智库专业化建设的步伐以及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智库的发展而言，为了保证其独立性就必须形成自己的专业性。智库的专业性就包括建设专业队伍、形成专业特色以及咨询工作的专业特点等。利用其综合性的优势和强大的人才优势去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是美国那些大型智库的一贯做法。除此之外，美国的大型智库几乎都有自己主要的专业及主攻方向，如兰德公司擅长于军事战略；布鲁金斯学会擅长中东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擅长外交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擅长国防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擅长于贸易和经济政策；胡佛研究所则擅长于美俄关系等等，这些对我们智库往专业性更强的方向发展都很有启发。而事实上，智库的专业性建设与其管理体制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从行业上看，科学且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对智库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从智库的内部管理体制来看，若想智库的专业性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有一套属于本智库的独特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

### 3. 配套环境不完善

从根本上说，智库要发展，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外部条件：一是要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尊重专业独立性的政府决策氛围；二是全社会要有比较开放的公共空间，也就是公共舆论，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决策。依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智库发展的社会环境并不太具备。

首先从政府部门对待智库研究的态度来看，政府部门要么将智库视为可有可无的决策支撑机构，要么要求智库承担本不该由它们承担的职能。事实上，我国政府对智库的扶持力度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对政策咨询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不足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间存在着，与此同时，政策咨询意识淡薄的现象也随处可见，而且越到基层情况越严重。除此之外，由于财政拨款是我国大多智库的主要经费来源，这与其多是隶属于各级行政部门分不开的，因此从体制内而言，智库似乎总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官方智库尚且如此，那些非官方智库更是难以想象。其次从目前社会民众的反应来看，对智库的认识也存在着诸多误区，往往将智库视为政府利益的代言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代表。完善我国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还需努力构建智库市场化的运作体制，让智库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首先，智库必须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因为对于经费的过多依赖容易造成咨询

工作独立性和客观性丧失的后果；其次，对于智库而言，独立的人才管理权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若仍然坚持过去那一套编制内的管理方式，不仅容易造成人才交流受限，研究人员工作懒散，创造热情乏力的后果，而且还容易引起“沉默是金”的不良习惯，即以沉默对待新见解的弊病；最后，智库必须有独立设置课题的权利，因为那种指派性的课题不仅使智库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更为关键的是，它在捉杀了创新课题设置的同时还丧失了创意性的咨询研究，这些对智库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 【专家视点】

### 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学习时报》（2013年4月8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类似于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具有思想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智库的智力支持。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创新能力、产品（研究）质量，已经成为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

#### 中国智库现状与未来发展图景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却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智库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的需求。另外，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公共外交的推进。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完善和发展中国智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智库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官方智库发展得比较成熟，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民间智库数量少，影响力薄弱，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体上没有形成官方、大学、独立三种智库模式的互补机制。

第二，官方智库靠近政府领导和高层决策层，其研究成果很容易传达给直接决策者，也更易于被接受和采纳。但是由于与政府的附属性关系，官方智库在研究选题的确定、研究的纵深度以及创新性方面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第三，大学智库数量很多，但是由于缺乏相对稳定与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优势。在目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环境下，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

#### 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图景及主要功能

第一，在可预见的未来，官方智库依然保持其核心影响力，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创新性、前瞻性政策建议。但是一部分官方智库将在其资金来源、

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上进行大幅改革，吸取西方独立智库的经验，从而使其研究选题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加多元化，研究成果更具独立性和创新性，从而真正助力于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大学智库将承担起思想创新、政策建言、人才培养、影响舆论、国际交流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首先，大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次，大学具备充足的人才资源；再次，大学智库在资金运营和人事管理上相对官方智库而言更具弹性；最后，就国际交流、公共外交而言，中国的大学智库与官方智库相比在全球智库市场上更具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独立智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稳步扩大，逐渐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智库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智库将主要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功能，助力于公众参与民主政治，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中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依然相对不足，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信息量过大，无法真正满足公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而智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的理性渠道的作用。

### **政策建议**

邓小平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同样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中国智库的发展。诚然，美国智库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中国智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中国应该从政府、智库、公众三个维度上努力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同时还要具备“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首先，进一步完善政策咨询机制，为智库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其次，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资金上要对智库尤其是独立、大学智库给予大力扶持，鼓励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再次，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最后，政府要给媒体的政治传播创造更加宽松的舆论空间，让各种智库的观点和言论可以充分表达。

就智库本身来讲，一个智库是否能产出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人才和运行机制。因此，中国智库首先应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在内部机构设置上，应明确智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除了政府资金外，应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智库所从事的是指导现实政治决策的对策研究，而不是关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在研究人员设置上，应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智库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智库的合作，善于整合研究资源；对于中国的大学智库而言，应进一步加强大学智库的结构与平台建设，加强对政策研究的重视和人才的选拔，不断推进大学智库与世界各国智库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智库应充分借鉴西方智库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智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的，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目前，中国大部分智库在拓展公众影响力方面非常薄弱，这一方面源于智库领导者本身没有意识到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源于缺乏与媒体沟通的专业人才和经验。除此之外，智库的市场营销不仅要着眼于本国，还要着眼于世界，要充分意识到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意义和价值。

所谓“责任意识”是指从事智库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利益和社会民生角度出发，独立思考、大胆直言。所谓“全球意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智库的领导者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考虑智库的发展战略，加强与西方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二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政策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意识；三是中国智库不但要影响本国政策还要走出中国、影响世界；四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面临的共同问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暖、能源环境、反恐等问题越来越多，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解决，需要各国智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品牌意识”指的是中国智库要有明确

的使命和目标，围绕这样的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

## 当前国际知名智库发展向何处去

《学习时报》（2013年4月22日）

国际知名智库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和大批高层次学者，从事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重大问题研究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一般具有较长的历史，对所在国家的政府决策和重大国际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发言权。虽然国际知名智库各自关注的领域与研究重心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力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但作为一个总体，国际智库的研究方向与定位还是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演进以及世界各政策需求的变化发生一些细微调整。

### 研究领域全方位、跨学科，研究选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

早期的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出现之后，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展，泛指一切进行未来规划性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服务的非政府研究机构。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领域问题的不断增多，国际智库研究重心与主要关注点也发生一些转移，特别是一些综合性国际知名智库的研究领域，逐渐从传统的内政、外交、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资源、生态、太空等新领域，研究问题呈现出综合性、全面性的趋势。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早期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服务，目前其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业分析等多个领域。兰德公司坚持综合性的发展路线，将“多样性”作为公司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几乎所有的项目都由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学者采取各种集体研究的方法来完成。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建立之初，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问题方面，目前这一机构已经将研究扩展到外交、防务、发展、教育、文化与宗教等领域。国际智库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的政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越来越具有综合性，需要从多个领域、多种角度进行综合性分析；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智库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一些智库也通过拉长研究战线扩大其对本国政府决策的影响。

## **跨国性研究活动日益增多，科研项目的国际化倾向更为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和互动程度日益加深，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在全局的视野下进行观察，用国际化思路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威胁和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实现各国政策研究领域的资源共享，国际智库机构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许多国家的智库通过不断引入国际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将“知”与“智”放到国际社会中进行推敲，以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一是各国智库通过人员的交往、国际研讨或者正式结成智库网络，就某一区域性、跨国性课题开展合作研究，全球性智库合作研究网络日趋密切。二是通过智库交流与合作，努力解决国家间的敏感性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战略利益交织，各方关注但又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上，智库机构往往扮演“第二轨道”的外交接触平台作用。三是在双边关系中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发挥推动双边加深了解与政策沟通的良好平台。

## **更加关注与本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性问题研究**

在当前的世界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的国际知名智库虽然开始将一部分研究力量用于涉及世界各国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但各国智库的研究重心仍然集中于本国核心国家利益的研究课题之上，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时，国际知名智库的研究内容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其研究成果也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如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智库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苏联的战略研究上，“9.11”事件之后，关于美国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反恐问题的研究迅速成为各大智库研究的热点，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能源问题、新兴产业革命及其影响等的研究则是当前许多国际智库的研究重心。欧洲的一些智库则将欧洲一体化、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北约在欧洲的作用等课题作为重要研究领域。日本的智库研究则集中于日本的国际化战略、亚太局势、东亚合作等议题之上。

## **重视对重大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努力打造智库品牌**

虽然当前国际智库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但大多数的国际知名智库并不是将其研究力量进行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力量于若干重点领域，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以期形成自己在特定领域的智库品牌，保持领先地位。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虽然其研究范围涉及几乎所有的领域，但其主要特色还是体现在与军方需求相关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之上。冷战时期，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是苏联与中国，当时兰德公司的一些研究成果堪称战略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冷战之后，兰德公司关于中国的国家战略研究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世界各国实力评估”项目的研究，并连续出版相关出版物，在该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 【院校扫描】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积极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新型智库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充分发挥全国领先的国际关系学科优势、开放灵活的国际交流优势，以及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优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战略研究智库。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1月24日发布的对各国6603家智库的最新评估报告，在全球150家重要智库名单中，中心排名第63位，是中国6家上榜智库之一，也是中国高校智库中唯一上榜单位。

#### 以提供政策咨询为核心任务，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

中心以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为目标，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开发表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中心核心成员经常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对外政策咨询会议。中心主任王缉思教授多次组团访美，深入了解美国内政外交，为我国对美政策的制定和对美外交的开展做出了贡献。中心常务副主任袁明教授长期担任联合国基金会中国理事，为中美高层交往建言献策，在中美人文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心还先后承担中央外办、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部门的委托研究课题20余项，得到各部门的高度评价。

#### 以产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目标，建设高水平政策研究型智库

中心通过跨学科联合攻关，组织校内外以及海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使中心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研究平台之一，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心完成了两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和“未来10—15年中国国际战略环境评估及应对战略”，连续四年承担教育部《国外高校人文社会发展报告》（年度蓝皮书）之国际问题研究部分的撰写工作，为国内同行提供该领域的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中心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年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国际战略研究简报》以及

《战略纵横》等出版物作为智库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传播平台，撰稿作者既包括中央外办、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政府行政人员，也包括美国、日本等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官员。中心出版物凭借其中国国家利益视角、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独立思考的风格，受到党政军相关机构官员、大学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 **以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为依托，为中外决策和专家学者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

中心凭借自身的研究实力和北京大学良好的内外研究资源，将主办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与对外交流融为一体。2011 年成功举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研讨会，2012 年、2013 年成功举办“中美亚太安全合作对话会”、“中国、美国与东亚秩序国际研讨会”等。中心在亚太安全研究中扮演了核心与前沿角色，被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遴选为“亚洲安全倡议”全球三个核心机构之一，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普林斯顿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日本东京大学、韩国知名智库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智库和学术单位长期保持着交流合作关系。

### **以培养中青年科研骨干为抓手，储备国际战略研究人才**

目前中心的 15 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多为 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其中 10 位为副教授，他们通过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得到了锻炼。中心还为国内外访问学者提供理想的研究环境，为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提供了良好的培训和参与研究、教学、翻译工作，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提高其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经验与能力。如 2011 年举办了“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国防论坛”，2012 年与伦敦国王学院合作举办了战略研讨班，2012 年、2013 年两度为丹麦皇家防务学院举办“高级参谋培训班”。

### **以营造客观、理性的中国国际战略决策舆论环境为纽带，引导公众全面、准确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

中心通过各种国内外主流媒体，对近年来中国外交中一些重要前沿问题发表专业性见解。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财经》杂志、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朝日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的国际栏目，经常有中心研究人员的专业评论。中心研究人员力戒人云亦云，力求不

媚时俗，坚持学术独立，恪守职业道德，使自己的专业知识真正服务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公众。★

## 以新型智库建设 推进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结合学校优势和特色，积极服务国家及地方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

### 大力推进新型高端智库建设

一是与海外知名智库机构合作，打造国际化智库。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与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新兴市场论坛（Emerging Markets Forum）合作成立新兴市场研究院，成为各国政府领导者、高层管理人员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士进行对话和探讨的有效平台，在新兴市场经济研究与开发领域遥遥领先。二是加强智库人才引进，推动对策研究开展。先后引进了魏礼群、李晓西、王振耀、关成华等原政府部门领导同志，建立了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等机构，充分发挥他们既具有广泛实践经验，了解政府政策需求，又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综合优势，有效地为政府决策服务。三是推动研究方法创新，建设大型数据库和调查中心。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开展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经过长期建设和积累，已经成为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威数据库，该团队关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得到学界、政府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学校还将建设“中国教育资源数据库”、“中国教育政策法规资源库”等，努力打造国家教育决策信息库。

### 为国家决策提供优质智力支持

一是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学校发挥教育学科优势，积极动员教师全面参与国家教育改革和重大政策制定。顾明远教授根据多年的调查研究，在参加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建议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得到了肯定并已上升为国家政策。学校动员 40 余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重

大教育规划论证和修订工作，参与的专家人数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首位。与民进中央共建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已完成并提交了 60 余份政策建议、咨询报告，得到多位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专门批示，8 份政策建议成为 2013 年全国“两会”提案。二是为社会改革和文化发展献计献策。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报告《我国孤儿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促成了 15 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体制及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撰写的《200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为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肯定。《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获得国家部委以及山东省、山西省等政府领导的批示。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教授牵头研制完成的《规范汉字表》，是我国自 50 年代汉字规范以来第一次重新改定的汉字规范，即将作为国家法令性文件发布。

### **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服务北京教育决策。与北京市共建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致力于推动北京教育改革与发展，先后开展了 30 余项面向教育改革的服务性研究。其中，《北京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分析报告》获得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调研报告一等奖，为北京市制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出台相关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智力支持。《北京市教育经费供求预测研究》对北京市教育经费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研究，为编制北京市教育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北京市高等学校拨款方式改革研究》、《北京市属学校生均定额标准研究》对定额标准进行了分析和测算，提出了学科综合定额为基础的拨款方式、公式与标准，被北京市教委和财政局采纳。二是支持北京教育现代化建设。通过与北京市区县的战略合作，整合多学科资源为区域教育现代化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先后与北京密云、石景山、昌平等区县政府共建“农村基础教育现代化实验区”，开展区域性教育信息化推进、基于发展性评价的教育质量提升体系建设、基于校园网的互动学习型组织建设等多项实验。通过区域实验，全面提升了实验区的综合教育质量，尤其是教育信息化水平。三是服务北京文化事业发展。以服务北京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为宗旨，在北京文化发展战略、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规划等方面为北京

市委市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服务。其中《北京文化发展报告》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北京电视台等报刊媒体也刊发或播出了相关报道。《西城区文化兴区战略规划及行动纲领》、《西城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得到西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肯定。★

## 南京大学智库建设 重协同 筑平台 出成果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强调学科交叉和问题导向，直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大力推进智库建设，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实现了提升自身办学实力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双赢。

### 推进协同创新 催生高端智库

学校鼓励在中国边疆安全与周边合作发展、中华文化认同与传播、两岸关系、大国关系等领域，打破政策、学科壁垒，组建跨部门、跨学科团队，深入开展协同攻关。今年，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家认定的首批“2011 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南海国家战略为立身根基和发展目标，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旨在打造南海问题的高端智库。中心组建 8 个平台，启动南海数据仓库建设、证据链搜集整理、话语权建设、综合情势推演和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通过承担一批国家重要任务，开展一系列专项研究，向中办、国办呈交了 12 份信息专报。中心研制的“数字南海”、《中国南海主权态势演变图集》等，为中央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中心还积极发挥平等交流和对话协商机制的作用，提高国际影响力，争取国际政界、学术界的支持，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中国的立场和声音。

### 打造基地平台 拓展智库建设

学校建构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部共建重点研究基地-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为主体的“金字塔”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体系，推动创新平台发挥智库功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成功举办 30 次，论坛以江苏发展为主

题，为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前瞻性的咨询服务，部分成果转化为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第2次论坛“结构调整与江苏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机遇”，使江苏成为全国首个提出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的省份；第22次论坛“科学发展观与新苏南模式”，促进了苏南新的发展战略的形成。学校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深度参加了深圳市、江苏省等的应急预案建设、信访案例咨询、突发事件现场处置、网格化管理、应急管理等多种类型的实践研究，既服务了国家需求，也升华了理论思考。

### **强化精品意识 打造高质量的成果**

在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学校强化精品意识，以团队建设、学科交叉、成果培育为重点，凭借“多学科、高起点、重质量”的科研特色，为若干领域的应用对策研究提供基础支撑。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78卷、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对那段重要历史进行了艰难“抢救”与真实再现，解决了中日之间的一些历史争论，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日本、美国官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该中心11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已正式出版。在直面文化认同、中日关系、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中国形象等现实问题时，及时迅速发出高校学者的声音。李国强教授等在《人民日报》发表《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等文章，提出“琉球问题可以再议”的观点，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赏。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出色完成国务院委托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地域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研究》项目，徐艺乙、贺云翱两位教授直接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起草工作，多项文化遗产保护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 **浙江大学在“顶天立地”中推进一流智库建设**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秉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顶天立地”和“高水平、强辐射”，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建立起若干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产出了一批决策咨询服务成果。

### **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

学校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积极鼓励和引导研究人员关注现实问题，支持应用类研究机构的成长，特别是支持经济、管理、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高，培育出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研究中心、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等具有较强决策咨询服务能力的研究平台。在此基础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政府合作，先后组建西部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等，逐步形成了“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

### **实施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激励措施**

如何发挥智库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如何发挥智库中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学校一方面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突出“应用与采纳”类成果的重要性，采用物质奖励及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教师主动将理论成果运用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决策咨询中去。另一方面，鼓励学院和教师主动对接省部级政府机构，联合共建研究中心（院）。《浙江大学校设研究机构管理办法》对智库机构的成立条件、人事管理、研究生管理、公用房管理等方面给予更规范的管理。特别在智库的人事管理上，学校采取聘用专职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独立名额分配等方式支持智库建设，逐步建立起一套鼓励支持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应用对策研究、服务决策咨询、提高应对重大问题综合研究能力的有效机制。

### **建设基础平台，改进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提高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推动人文社科研究范式转变、方法转型，学校投入上千万元建设设备先进、功能强大、整合性强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包括四大功能模块，即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政策仿真实验室、实验社会科学实验室和数据技术中心。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推动公共政策研究从定性为主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的历史转型，立足于运用先进计量技术、建模技术和运算技术，帮助各级政府算好账，厘清各种可能的决策方案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机理，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 **回应国家需求，服务政府决策**

学校主动回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的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加强战略性、

前瞻性、对策性研究，着力提升决策咨询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承担的科研项目中，与决策咨询有关的项目达到 500 余项，100 多项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批示。其中，2011 年就有 5 份咨询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70 多份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不少研究成果被各级政府采纳，直接转化为政府决策。

---

报：校领导、校长助理

发：党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部、人事处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11 日